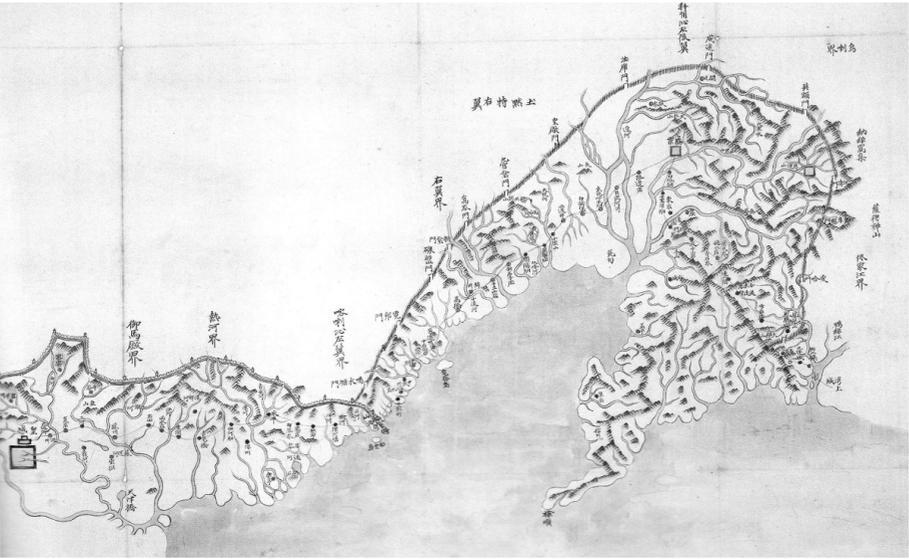


# 从明初到清末,持续500年时间 朝鲜半岛使臣诗意写辽东

本报记者 傅淼巍

宝藏辽宁 BAOCANGLIAONING



朝鲜半岛使团所画《燕行舆图》。

## 山河俊美,行程艰险

“自明朝洪武初年到清朝光绪年间,朝鲜半岛使臣赴中国的出使之旅持续了500余年,谱写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睦邻友好的华章。”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温科学对记者说。

温科学介绍说,据《明实录》《李朝实录》和《高丽史》等文献记载,明朝时期,朝鲜半岛共派出使团1252次,平均每年出使4.6次,每个使团平均为30人,常常是上一个使团还未离开中国,下一个使团又已抵达。到了清朝,为了体恤朝鲜半岛使臣路途辛劳,朝廷把冬至、正朔、圣节三个使团合并,临时的谢恩、奏请、陈贺、进香、请安等使团也常与每年例行的使团合并为一,因此清朝时朝鲜使团少则二三百人,多则四五百人,待遇也要比明朝高,位居亲王以下、各国使臣之上,能经常得到皇帝的接见、赐宴、赏酒。

至于朝鲜半岛使团的行程,则多有变更。如明初目的地是南京城,清初的目的是盛京城,大部分时期则要到达北京城。至于具体行程,则有陆海交替和纯陆路之分。

“路线虽几经改易,但今辽宁地区在整个行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目的地在盛京时,使臣所经路段均在今辽宁境内,即便走海路,辽东半岛也是必经之地,即使到北京城,其2/3旅途也在今辽宁地区——当时称为辽东。”温科学说。

难能可贵的是,这些赴中国的朝鲜半岛使臣留下了大量使行记录,记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,明朝时被称为《朝天录》,清朝时被称为《燕行录》。温科学表示,这些持续500余年、生动且具有现场感的使行记录,以其独特的视角,记录明清时期辽宁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,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,是对中国相关史料的有益补充和佐证。

朝鲜半岛使臣所写的《燕行录》。

朝鲜半岛使臣渡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,在辽东山地、辽河平原、辽西丘陵中穿行,最直观感受到的是辽东的地理风貌,辽宁境内的俊美山川遂成他们的观察和吟咏对象。凤凰山是使臣们跨过鸭绿江后所见到的第一座大山,诸多朝鲜半岛使臣为其震撼,以诗描绘其雄奇险秀之状,其中尹根寿(1537—1616年)即兴赋诗:“征车又过凤凰山,回首烟云缥缈间。天外数峰谁得似,镜台妆罢美人鬟。”

位于广宁城(今北镇)西五里的医巫闾山,亦为朝鲜半岛使臣们赞叹,其中黄士佑(1486—1536年)称赞它为“万壑千峰奇秀特立,如鬼剜神镂,飞腾涌出于云霄间”。

当然,当时辽东地区的交通条件、开发程度也让行程充满艰辛。《李朝实录》于明正德元年(1436年)记载:“在先本国使臣来往东八站(指今丹东至辽阳之间)一路,自梁山高水险……冬月冰雪滑深,人马

多有倒损。又有开州、龙凤等站,绝无人烟,草树茂密,近年以来猛虎频出作恶,往来人马,实为艰苦。”

对路途艰辛,朝鲜半岛使臣丁焕(1497—1540年)也写道:“昔闻诸人,辽阳以东,鸭绿以西,空山绝谷,羯胡之乡,荒草四合,蚊虻扑面,行者甚苦。”使臣许蔚(1551—1588年)则对今本溪境内的青石岭记述道:“逾青石岭,岭在一路比诸岭为最险,两山挺出,林樾深邃,径石棱牙,马多颠蹶,人颇苦之。”可见,辽东山多且险峻,朝鲜半岛使臣想要通过这些山岭也不那么轻松。

水患也时常造成使团行程延误,如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,朝鲜半岛使团在通远堡被暴雨困了五天,河水减退后方冒险渡河,随行使臣朴趾源(1737—1805年)记录了渡河过程的艰险:“下隶三十余人,赤身抬轿,至中流湍急处,轿忽左倾几堕,危哉危哉,与正使两相抱持,仅免坠溺。渡在彼岸,望见渡水者,或骑马项,或左右相扶,或编木为扉而乘之,使四人肩抬而渡。”渡河时的艰险,众人的慌乱之状,跃然纸上。

辽河平原的壮阔让朝鲜半岛使臣感触尤深。朴趾源路经新民郊外时写道:“回看东天,火云滂沱,荡出一轮红日,半涌半沉于蜀黍田中,迟迟冉冉,圆满辽东,而野地上去马来车,静树止屋,森如秋毫皆入火轮中矣。”寥寥数语,呈现的是朝霞之下良田广袤、车马如梭的安定祥和景象。

温科学说,500多年中,朝鲜半岛使臣看到了鸭绿江、大凌河的荣枯,欣赏过凤凰山、医巫闾山的四季风光,他们一路悉心观察、详尽记录,对辽宁境内“六山一水三分田”的独特生态环境有着细致的描写,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别开生面的辽山川川历史图景。

**核心提示** 明清两朝时,朝鲜半岛的使节团频繁前往中国,留下了大量的旅途记录。由于使节团经行的大部分路段在今辽宁地区,这些记录对当时辽宁地区的地理、文化、军事、人物等方面均有生动翔实的记述,这也成为研究明清时期辽宁历史的珍贵资料和佐证。

## 儒家文化是友好交往的纽带

旅途中的颠簸劳顿并未降低朝鲜半岛使臣与辽东人结识的热情,据《朝天录》《燕行录》记载,跨过鸭绿江后,每到一地,使臣们往往迫不及待地与当地人展开交往。

温科学表示,朝鲜半岛使臣们对儒家文化仰慕,是他们主动结交当地人的动力。

儒学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,到13世纪末,程朱理学传入高丽,并迅速被接受,在朝鲜王朝时期,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,贯彻到各种制度之中。

而在明清时期,随着书院在各地相继设立,儒学的广泛传播,在辽地培养和会聚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社会名流;大量内地人士被流放到关外充军的同时,也促进了辽地民风从尚武向崇文转变,出现了“礼乐文物彬彬然”的景象。

“儒家文化是朝鲜半岛使臣与辽东人友好交往的纽带,上文提到的许蔚、朴趾源等朝鲜半岛使臣均为名儒,他们途经今辽宁境内时,首选与当地的文人贤士结交。”温科学说。

明成化二十三年(1486年),朝鲜半岛使臣李昌臣返程时,在辽东遇到了贤士邵奎,当时邵奎刚好辞官还乡,双方言谈甚欢,李昌臣于是吐露了一桩心事。

原来在出使之前,朝鲜王朝命他代购《苏文忠公集》(苏轼的文集),他试图在北京寻觅此书,却未能买到,于是询问邵奎能否相助。邵奎便把李昌臣引入书阁,取出《苏文忠公集》赠给他。李昌臣急欲出资,却被拒绝,邵奎说:“何用价?所以赠之者,以他日不忘之资耳。”李昌臣回国后,向朝鲜国王汇报了与邵奎的结交经过。朝鲜国王很重视,详细询问了交往的细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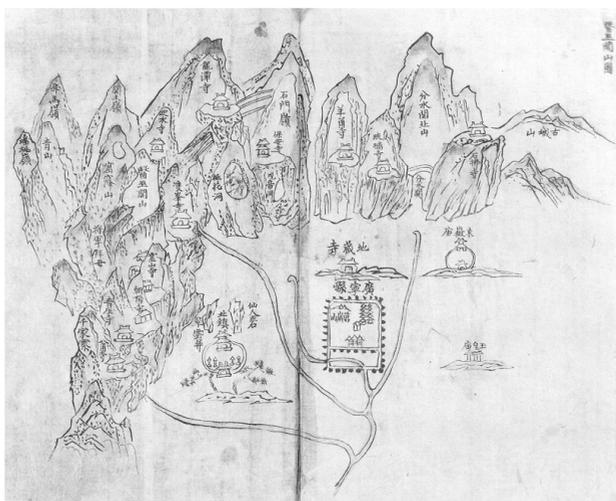
温科学介绍说,不仅李昌臣,

另有多位史臣也与邵奎有过交往。明弘治元年(1488年),朝鲜圣节使蔡寿返回途中,在辽东白塔寺见壁上有邵奎诗,便以诗相和,遂与邵奎相识,“与之谈话无所不通”。蔡寿对邵奎的评价很高,称其“才德甚高,辽东大人等皆尊敬之”。蔡寿等人还建议,有些学术上的问题可以请教邵奎,得到朝鲜国王的准许。

明万历四十二年(1614年),朝鲜半岛使臣金中清经过辽东时,杨武祥、郑汝钰、杨翹三名秀才前来拜会。郑汝钰口音不像辽东本地人,金中清便通过译官询问:“你无乃南土人耶?”郑汝钰有遇知音之感,回答说:“我果绍兴山阴人。”杨武祥为前辽东副总兵杨元之子。杨元是赴朝抗倭名将,在平壤之战、碧蹄馆战役中功劳显赫,在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南原之战中,率3000军兵誓死抵抗近5万日军,却因战败丢城,被斩首示众。念及杨元对朝鲜有恩,金中清在笔下写道:“今见其子,不觉感然。”

朝鲜半岛使臣与辽东士人的交往中,双方的和诗、赠诗非常普遍。他们通过诗文传情达意,进行文化交流。如朝鲜半岛使臣金世弼(1473—1533年)两度出使明朝,在辽东与顾秀才相识,先后作诗两首赠予顾秀才。写下“会合何须问后先,神交千里且忘年”“联床尽日情无尽,欲别难禁涕泗流”等诗句。金世弼把与顾秀才的交往看作千里之交、忘年之交,极为珍视,分别时“难禁涕泗流”的描述令人动容。

温科学说,朝鲜半岛使臣与辽东文人的交往中,双方主动性高,交往地点也很灵活,住宿的学人家、驿站、路途均作为他们的交往地点,和诗、赠诗、饮酒、畅谈,交流思想,是他们交往的主要内容,由此结下了深情厚谊。



朝鲜半岛使团所画《医巫闾山图》。

## 史记 SHIJI

### 辽东大战时 使臣开始走海路

在明朝中后期,朝鲜半岛使臣的笔下频频出现对辽东武将的描述,使臣们对辽东的战事极为关注,这与当时辽东边患频仍的局势密切相关。

辽东为明朝重要的边镇,朝鲜半岛使臣李廷龟(1564—1635年)形容其“北抵幽都鸭江,全辽形胜控三邦,地连海寇提防紧……”

“辽东的安危关系到大明江山是否稳固,也关系到朝鲜半岛使臣的使行之路是否安全,在朝鲜半岛使臣的笔下,对辽东边将尽早解决边患问题饱含期待,因而辽东总兵、经略是使臣们关注的重点。”省博物馆馆长温科学解释。

明朝辽东总兵杨照(1524—1563年)深得朝鲜半岛使臣好感。杨照效法岳飞,在自己的胸前、后背各刺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大字,为官兵以“冰清玉洁”四字明志。使臣许蔚在《朝天录》中记载,杨照“长身五立,望之伊若神仙中人”“持身清谨”“用兵神速”。杨照战死沙场后,其在屯屯(今绥中前卫镇)的祠堂成为诸多朝鲜半岛使臣敬仰、缅怀这位将军的重要场所。使臣李廷龟途经该祠堂时赋诗:“征虏将军忠壮公,千秋墓道整英风。谅为烈士当如是,麟阁何须第一功。”

在《朝天录》中,使臣许蔚还记载了辽东总兵王治道之死:隆庆四年(1570年)九月,蒙古部落进犯锦州,王治道“即率亲兵不满一千,往逐之”。被“诱出长墙”“稍深入,伏兵四面云集”,王治道“全军皆没”。

王治道身亡后,李成梁被提拔为辽东都督兼总兵。他镇守辽东30年,对辽东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,朝鲜半岛使臣对其十分敬仰。李成梁掌控下的广宁,在朝鲜半岛使臣李安纳(1571—1637年)笔下呈一派安定景象:“广宁是雄镇,士马最精强……昔日战征地,今为游侠场。”朝鲜半岛使臣裴三益(1534—1588年)听说李成梁威声大震,边境安宁,遂作诗赞赏李成梁:“将军麾下剑光横,人道堂堂万里城。大振威风惊虏胆,远输忠肯卫皇宗……”

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萨尔浒之战后,辽东形势危急,熊廷弼受命经略辽东。第二年经过辽东的朝鲜半岛使臣黄中允(1577—1648年)对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成效作了充分肯定。黄中允在《西征日记》中写道:“阵士四五万名皆全装贯带,盔甲鲜明,且制造战车逾万辆,可防虏骑冲突,亦足慰矣。”

温科学注意到,朝鲜半岛使臣对袁崇焕格外关注。使臣赵庆男在《乱中续杂录》中如是评价袁崇焕:“天朝得袁崇焕为经略,时年二十七,智虑深远,用兵如神,今在广宁,多设方略,临敌策应,发谋千万,预备火具,以逸待劳,鞑奴大举俱进,连败而返。”

朝鲜进贺使李于于崇祯二年(1629年)向本国君主提交的状启(乱中续杂录)中,披露了他与袁崇焕会见之事。当时袁崇焕对李说:“军门也言,自辽被兵,无鲜使之驻久,信使重来,再见汉官威仪,令昔之感,欣然然矣。”

温科学说,不难看出,因受女真的威胁,朝鲜使节不敢再走辽东路线,明朝威信一落千丈,袁崇焕深感遗憾。

按照袁崇焕的建议,朝鲜半岛使臣经旅顺口、觉华岛,从宁远登岸,入山海关,抵达北京城。温科学说,这条线路虽然行程更为艰险,但对袁崇焕来说,“重新树立汉官的威仪”更为重要。(本文照片由温科学提供)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

#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

扶着双肩,走在春天。步调一致,心阔地宽。携手同行,中国梦圆。坤宁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上海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